

往事如昨

此生无悔做盐工

李波

我的父亲生于1936年,奶奶40来岁因病去世,撇下6个孩子,父亲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弟四妹。为了帮爷爷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父亲一天校门也没进,从小就跟着爷爷干农活,学编盖垫、炕席,补贴家用。常常为了赶集,他整夜整夜地编,有时编着编着一歪倒就睡着了。

1959年3月,莱州盐场扩招工人,二叔报名并被招工人场了。但二叔没干几天就因腿疼回家休养,父亲就去替二叔干活。后来二叔又生“炸腮”(腮腺炎),等二叔的病好了回去上班时,盐场领导说,不用换了,反正你们亲兄弟,谁干都一样。后来盐场领导说,当初之所以要留下父亲,是因为父亲干活实在,能干又肯干,身体也好。

在此后的多年中,父亲工作成绩突出,年年当先进,尤其是担任组长以后,他所在班组每年的产盐量都在全盐场遥遥领先。父亲被表扬的次数多了,有人不服气,尤其是土山当地的原盐民工人,他们觉得自己祖祖辈辈晒盐,有祖传的秘诀,怎么就干不过一个“山草种子”呢?父亲更不服气:“什么‘山草种子’?什么不是人学的?”后来,有人要求到我父亲所在的盐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场部还真组织人员去调研了。

调研人员问我父亲,你们是怎么干的,为何产量一直比别人高?父亲说,晒盐与种地差不多,一靠面积,二靠上心。没有地,哪来的产量?大家这才发现,父亲所在盐田的周围还有不少小“荒圈”,那是父亲带领同事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垦的“自留地”。父亲说,多几分面积,就多几分产量。另外,父亲手下的盐田维护得好,渗漏少,同样的卤水量和同样的盐滩产量自然高。父亲说,另外还有两个字——“用心”,就是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中间多观察。上班比别人早点儿,到现场看看当天的工作安排,备足备好所有物料、工具,最大程度地减少“窝工”现象,这叫作“宁肯料等驴,不让驴等料”。下班比别人晚点儿,看看还有什么没干完的,明天准备干什么、怎么干,这叫“有钱难买回头望”。平日注意观察和研究天气,千方百计做好防雨工作。别人都下雨往屋里跑,父亲他们则是要往盐田跑,这叫“雨前抢一时,胜过晒三日”。这次调研在全盐场引起了轰动,并且掀起了“向李学明学习,改造盐田扩规模,精耕细作增单产”的活动。几年下来,莱州盐场的盐田面积成倍增长,单产纪录也不断刷新。

1967年3月,为了支援内蒙古吉兰泰盐田的建设工作,原国家一轻部盐务总局决定从全国各大盐场选调一批人员到吉兰泰盐田帮助建设工作。父亲被选为莱州盐场25名援吉队队员之一。听说要到北京集合,不少人都红了眼。当时别说到京住一轻部招待所,就是进一趟北京都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人找到场部领导问:凭什么让他去?领导说,凭他能干啊。支援建设是去干活的,不是去

旅游的,更不是耍嘴皮子、吹牛的。那人说,不比试比试,怎么知道谁能干?于是场部就组织了一场“挑战李学明”的比赛活动。

比赛第一项是扶沟。选同一条卤水沟,划为两段,抓阄上位,看谁先合格完工。哨声一响,只见那挑战者急急忙忙,看似挺快,但该抹一下的,他常常要抹两下。而父亲呢,他不急不忙,抹锹上泥像是长了眼睛,而且那泥也像是长了吸盘似的,泥到生根,不脱不落,步步为营。开始看似不快,但不一会儿就超过了那个挑战者。最后,父亲轻松获胜。事后父亲说,这叫“别看你忙得欢,我是一枪一个眼”。

比赛第二项是推车扒盐。在同一块盐田选两档盐垄,也是抓阄上位,比比看谁先把盐运到指定位置。这次出场挑战的是一位车轴汉子,力气不小。比赛开始,起初两人看不出有什么差距。转眼间到了开饭时间,领导说,先吃饭,吃完饭再一起开始。但挑战者自信比我父亲“有神头儿”,说他不用吃。父亲心里有数,不能和他硬拼,便坐下来休息一下,抽支烟,然后掏出提前准备的几块饼干和几两白酒。对方一看,心中窃喜:你吃吧,我趁这工夫再超你几车。父亲早已看出对方的心思,不慌不忙抽完烟,吃完饭,喝完酒,起来伸伸腰,踢踢腿,朝双掌上吐了两口吐沫,拍得啪啪响,接着开始追赶。父亲经过这一次休整,明显体力恢复不少,步伐也越来越快,而那个挑战者的步伐早已断崖式下滑,最后已体力不支,摇摇晃晃。结果父亲获胜。父亲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劲不在挽辫子上”。

比赛第三项是“修圈”,即修补盐池底部烂泥破洞。盐池底部是盐田的聚宝盆,能不能产盐,产盐多少,与此有很大关系。如果搞不好,卤水会渗漏跑掉,产量必减。这项工作一直属于技术活,以前都由土山当地的原盐民把持着。比赛开始,两人都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开挖、除旧土、填新土、加卤水、搅拌、脚踩……有板有眼。最后,经过比较所修部位的表面硬度、卤水渗漏度,还是父亲获胜。围观的工人和评委们都纳闷:人家是祖传,你老李是从哪学的?父亲说,为了学习这门技术,我不单在工作期间认真观察、向老师傅学习,还曾多次利用休班时间到附近村庄找有技术的老师傅请教过。

经过这次比赛,挑战者们都服了,父亲的名声更响了。1967年3月,父亲与另外24名同事在场领导孙祥秀和基建科长王同元的带领下,参加了支援内蒙古吉兰泰盐田的新田建设工作,并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1968年父亲与同去援建的同事们在北京人民公园合影留念,现在我家还保存着父亲的这张照片。

父亲曾自豪地说:“我到过北京,登过天安门,进过人民大会堂,这辈子值了!”



方言撷趣

牟平县志里的两句“狠话”

刘甲凡

牟平方言里有两句“狠话”,分别收录在1936年版和1989年版的《牟平县志》里。其中一句是“欲上浩浩山耶”,另外一句是“急着出北门——活够了”。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基本差不多,其背后都各自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历史故事。

欲上浩浩山耶

浩浩山位于牟平城南约5里路,今名浩山,属牟平区武宁镇辖区,方圆有十余里的范围。

清初,社会动荡。1650年,栖霞人于七以淘金工为主体,联合胶东各县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了胶东第一次抗清暴动。他率领千人攻陷宁海州(今烟台市牟平区一带),将知州刘文琪枭首示众。当时的清政府忙于南方战事,无暇顾及,遂采取怀柔政策,招抚于七为栖霞把总(陆军基层军官)。1662年,清政府待各地基本平定之后,便腾出手来派重兵对于七部进行围剿。于七率部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于七部仍分散活跃在胶东各地。清政府严令各地官府对他们进行了疯狂镇压。其时的宁海州知州陈一朋亦派捕役到四乡严密搜捕参与暴乱的党徒,“获之不待审决,辄使捕役毙于此山(浩浩山)中”。如此一来,捕役们便趁机敲诈平民百姓,无故冤死者不计其数。恰如蒲松龄在《聊斋》之《公孙九娘》一文中描写的那样:“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当时有一种民间传闻,每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浩浩山上常常传出冤魂的哭泣声。

“由是遂为口实,凡小儿口角,辄云‘欲上浩浩山耶?’”这句话收录在1936年版《牟平县志》“杂志 轶事”篇,并一代代流传下来,以至于到我们小时候斗嘴的当口,还常常会这样说“你是是不是着急上浩浩山——活得不耐烦了”。

急着出北门——活够了

早年间,牟平县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建有一门,东为玄武门(后改为集庆门),南为顺正门,西为奉

恩门,北为镇海门。平日里,只有东西南三门通行,北门只有在官府要问斩犯人的时候才打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牟平府衙的法场就设在北城门外。这期间,影响较大的处决犯人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3月,军阀张宗昌率部众5万人讨伐背叛自己的刘珍年。刘军退守牟平城,双方相持半月。后来,刘珍年用巨金买通张部围困东门的张营长,派2000余人趁夜色出了东门,埋伏于城东孟良口附近。拂晓时分,他们全部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一边冲杀一边高喊:“革命军来啦!”

顷刻间,张军乱了阵脚,5万人兵败如山倒,争相逃命。张宗昌逃亡大连,他的主要部将褚玉璞、徐鹤亭、苏馨斋、纪子诚、张鸣九、孙兴周、李震、刘玉宸及俄人白哈夫于福山被俘获,全部押到牟平城,在北门外被枪杀。为炫耀胜利,扩大影响,行刑那天,刘珍年严令乡民到现场观看,围观者达数万人。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短时间内,人民政府在北门外处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53人,其中包括伪牟平县长周东华。周东华在日军侵华后,历任伪满哈尔滨日报社社长,伪鲁东道尹公署专员,聊城、禹城、蓬莱、牟平四县县长(知事)。在牟平任职期间,他效忠日军,资助日军在水道、高陵、上庄等村设据点、修碉堡,指使日伪军频繁扫荡境内抗日根据地,残酷镇压牟平人民的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他逃匿北京。归案后于牟平北门外被处决。当时,这是轰动牟平的大事件,引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

就这样,久而久之,民间就产生了“急着出北门——活够了”这句歇后语。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狠话的当口,就会把这句话搬出来。后来,这句话被收录于1989年版的《牟平县志》“方言”篇。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浩浩山变成了果树满山坡的花果山,一年四季鸟语花香;“北门外”早已变成了宽敞笔直的北关大街和通海路,一派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无论如何,和早年间那两句“狠话”也联系不起来了。